

雋 鴻 飛 庄 嚴 著

文化哲學視野內的 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動力研究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文化哲学视野内的科学技术 与社会发展动力研究

隽鸿飞 庄 严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视野内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动力研究/隽鸿飞, 庄亚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6.4
ISBN 7-5316-4582-3

I. 文... II. ①隽...②庄... III. 科学技术-关系-社会发展-研究 IV.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711 号

文化哲学视野内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动力研究

WENHUA ZHIXUE SHIYE NEI DE KEXUE JISHU YU SHEHUI FAZHAN DONGLI YANJIU

责任编辑 徐德林
封面设计 傅旭
责任校对 徐岩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刷 黑龙江龙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70 千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16-4590-4/G·3496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隗鸿飞，男，1970年6月出生，出生于黑龙江省兰西县。现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哲学院教授、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兼任黑龙江省哲学学会理事。2003—2005年在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论历史发展的动力》2部，在《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庄严，男，1962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吉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和黑龙江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学习与探索》《理论探讨》《学术交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责任编辑 徐德林
封面设计 傅旭

序

20 世纪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 世纪兴起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进入到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并日益与生产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推动社会的物质生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特别是到 20 世纪,科学与技术的这种结合已经发展到了极至,这种科学技术的异化也日益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因此,20 世纪也是人类对科学技术自律发展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的世纪。但是,在诸多种批判科学技术异化的理论中,更多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反思,关注的是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增长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但是,科学技术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更多地是精神领域。

我们认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与技术分别属于人类文化的不同子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科学作为一种理论,其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知识;而技术属于实践操作的层面,是在具体生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工艺、技巧。它们在人类文化的总体之中并不能直接构成人类的生存意义。但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兴起的过程中,由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状况,科学一方面取代了哲学在人类文化中的

超越地位,开始成为人类生存的意义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科学又通过与技术相结合,为其超越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支持。因此,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必须与对人类文化总体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阐明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机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具体的阐述的过程中,我们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内在本质,即社会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过程,而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因此,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具有超越的地位,并不能在终极的意义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人自身,因而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才能真正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目 录

序

第一编 文化、科学与社会发展	(1)
一、发展的多重内涵	(2)
二、文化:人之生存方式	(14)
三、发展问题研究的文化视角	(24)
四、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35)
五、西方社会的兴起:一个典型的例证	(40)
第二编 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研究	(94)
一、现实的人——社会发展的动力	(94)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阐释	(115)
结语	(177)
附录 1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	(186)
附录 2 近代西方的人学历程	(204)
附录 3 全球化: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224)
参考文献	(241)
后记	(246)

第一编 文化、科学与社会发展

发展,自 20 世纪初就成为国内外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域,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与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 20 世纪后 25 年,一方面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的灾难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广大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都有力地推动了发展理论的兴起。我国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末,主要探讨的领域集中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等方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探讨的过程中,提出了“发展哲学”的概念。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阐述他们所理解的发展哲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但如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更多地着重经济的增长问题,也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尽管这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研究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对于“什么是发展哲学”这一问题,并没有人给予过系统的阐述。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就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确定什么是发展哲学,我们才能对当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一、发展的多重内涵

对于“发展”这一重要概念内涵的确定,可以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尽管很多人都使用这一概念,但却极少有人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大体来说,目前人们主要是在这样几个含义上使用“发展”这一概念。其一,是客观主义的含义;其二,是发展经济学的含义;其三,是发展的人本主义的含义。对发展含义的这三种不同理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也可以说,它们正体现了人类对发展本质的认识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也可以说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在逻辑上构成了人们对于发展概念内涵认识的不同的阶段。具体说来,发展概念的内涵最初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理性主义的进步观念;其二,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因此,对发展内涵的探讨必须从分析进步、进化与发展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入手。

(一)进步、进化与发展

“发展”一词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其一,进步;其二,是增长、生长。前者来源于西方文明中传统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念,而后者则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说是根源于斯宾塞自己称作‘综合哲学’的两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18世纪的产物,一种是有机体生命演化的观点,或者象斯宾塞所说的,‘有机体进化’。另一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①。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催生了客观主义“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1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广义而言,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于哲学家们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表现为一种世界目的论的倾向。古希腊的哲学家就认为,世界是一个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而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其发展表现为向着一个终极的“善”的运动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为我们描绘了宇宙万物由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和统一过程,从而形成了从最低级的、纯粹的质料到最顶端的“纯形式”,即“绝对的现实”这样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发展的过程。而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是可以通过对世界的“逻各斯”的认识来把握世界的本质,进而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进步的信念。进步是指人类社会将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向上运动着,它是内在于自然或人的,通过一个有规则的在过去、现在或将来发展的阶段系列的倾向,后一个阶段,也许偶尔有延误,或较少的压抑,但后一个阶段一定优于前面的阶段。也就是说按照进步的观念,历史是单向度地向前发展的,进步的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的,进步就是人类的命运。这种观念与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就形成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有了进步的信仰,现代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利于人类的福利,都是在替天行道。加上对科学无限的依赖,现代人更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该。正如 F. 佩鲁所指出的,“随着 19 世纪科学、技术和基础教育唤起的热情,人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进步是一种‘带来幸运的必然性’和一种自我维持和积累的过程”^①。正是基于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观念,人们对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必然性的观念,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

^① F. 佩鲁:《新发展观》,21 页,华夏出版社,1987。

然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进化”这一术语是从拉丁字“evolvere”演变来的,其最初的含义是伸展、展开。最初人们将如下过程称之为“进化”:即事先在雄性的精子里,或在雌性的卵子里,存在一个完全成形的微小机体,然后由它逐步发展或“展开”成完全成熟的有机体。对于进化的这种理解,也成为客观主义发展概念的形成的根源之一。虽然这一概念后来成了达尔文理论和宏观生物学领域的同义词。但是事实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进化论”通常指生物界的进化理论,亦称“演化论”,旧称“天演论”。进化论一词最初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所提出。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科学基础。近代生物科学的发展,使生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等进化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生物最初是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的,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在达尔文看来,生物进化论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并不包含所谓“进步”或“发展”的内涵。因为根据“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我们并不能比较不同的时期、适应于不同环境中的生物是低级还是高级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生存环境的适应者。正如丹皮尔所说的,进化论在达尔文谦逊的心目中,仅仅是科学上的一种学说,……但后来竟变成了一种哲学,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差不多变成一种信条了。……但是这种科学学说的正当影响,并不足以使它变成一个哲学体系,去说明实在的基础与意义。但是,由于在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精神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发展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任何新的科学的发现都必然被用于社会科学,由此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同样被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

生物进化论是被斯宾塞引入到社会学领域、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的。他认为,人类社会就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它的发展与生命有机体的进化遵循相同的规律。因此,进化就一方面是有机体生命、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进步潜在性的实现。在有机体进化中,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和功能的有机体是沿着进步的阶梯,从那些较简单的结构和功能的有机体发展而来的。在社会进化中,具有更复杂结构或组织的社会是从不太复杂的形式中逐步发展而来的。因此,进化就像这个理论所表达的,既是有机体或社会生活形式多样化的过程,又是有机体或社会“组织进步”的过程。这种观点在朱利安·赫胥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进化可以被看成为一种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生命体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可以得到不断增进的更佳效果。因此进化的演进过程是一个适应形式的发展问题,适应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外部适应的演进就是生物学效能上限的提高,即对环境增加了支配能力和独立性。内部适应的演进则是多方面的功能、效能和内部调适和谐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外部适应的演进不是得自于人类有机体的改善,而是得自于前面所说的进步,即人类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调适过程中的演进。内部适应的演进,得自于有秩序的关系体系化与个人之间的调适。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作为进化的源泉的生物的天赋与作为历史中的进步的源泉的社会获得特性混淆起来,认为人类社会原来和自然界一样,归根到底是进步的。但是这种情况却为一种严重得多的误解开辟了道路,即彻底地在发展的观念中排除了人的因素。

其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人类思想中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因为在人类思维形成之时,人类总是从

自身的社会关系出发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的认识毫无差别地统一在一起。“如果说事物的全体被构想为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是因为社会本身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的。社会是一个整体,进一步说,社会就是那个与之相关的所有事物所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整体。因而,逻辑等级就是社会等级另一个侧面,而知识的统一性也不过就是扩展到宇宙的集体的统一性而已”^①。由此出发去看待生物进化的过程,人就必然把自身视为生物进化的终点,认为人是高于所有其他生物的最高存在物。从而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就成为一个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进化的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

其二,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对生物的进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自然选择”,它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埃米尔·诺埃尔就曾指出,“当人们谈到达尔文的时候,通常想到的就是这个理论观点(自然选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了它,才能够近乎‘机械’地理解一个物种是怎样产生另一种的。人们撇开了令人费解的‘进化趋势’,而了解了进化是如何以一种几乎自发地方式进行的”^②。因此,人们在以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时,自然的原因就代替了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进步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客观主义所理解的发展的概念。客观主义认为,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因此,人类的

① 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埃米尔·诺埃尔:《今日达尔文主义》,2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的发展问题的研究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①。而近代以来兴起的进化论则为客观主义的发展观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的《辞海》中对于“进化”一词的解释中就指出,“进化”一词的第二个含义是“哲学名词,即发展。”

(二)发展——增长

对发展概念的另一种理解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即认为增长就是发展。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理论普遍认同的一种理解方式。就实质而言,这种理解与上述客观主义的解释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们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不同领域。

对于发展概念的这种经济学解释,是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一般认为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发展问题的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实证研究,这首先体现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一书中,首次将发展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并研究和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和促进或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等。斯密的研究为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方向。但是,对这种经济学含义的发展概念的普遍认同,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1951 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个题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在当时欧洲国家开始战后的经济恢复、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如何发展的情况下,这份由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参与起草的报告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24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观主义的信念。其基本观点认为:只要取得了投资和资本就能解决发展的主要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与按人口平均的资本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及其积累是“发展”的动力。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加速资本的形成的问题。根据他们的看法,增长、发展、进步三者是同义词,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这些名词只是为了“照顾到多样性”。在这种观点之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著作,如 A. W. 刘易斯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H. 莱本斯坦及其《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和 W. 罗斯托及其《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等等。从而形成了在当时发展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模式具有普遍性,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经济的增长,赶超发达国家的问题。

这种“增长 = 发展”的观念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西方人在他们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根据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推出了一个无限进步和日趋完善的未来。虽然这个未来并不是现实,而只是一个未实现的理想,却筑就了西方人无限的乐观主义信念。尽管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西方人的这种乐观主义受到打击,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乐观主义,并把它们传给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无限进步、不断完善和美好的未来不只是理想,而且也是现实,只不过这个现实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念使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就更加简单,也更加坚定。正是这种信仰构成了他们改变现实的决心和动力,却浑然不知已经将事实和理想混为一谈。正如 I. 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

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与权势的结合,也可说是两者的融合。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欲望。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使这些欲望在社会上首次合法化。‘积累,再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主旨,事实上,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了人皆可见、因庞大积累而产生的壮观景象,让世界人口百分之十至二十的人享受令人瞩目的消费水平。总之,实现无尽积累的梦想已经不仅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貌似可行”^①。

正因如此,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被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但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优先的模式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加强第三世界本身的经济结构,倒是做了大量损害农村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②。事实表明,有些国家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仍然未能取得普遍的社会进步,出现了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状况。因此,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经济优先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正是在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之中,一种新的发展概念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种新的发展概念要求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对社会发展的考察应以揭示特定形态社会(国家、民族是其具体表现形式)自身的要素、结构、功能的变化状况为目标。而且在这种研究中,作为社会活动者的人,始终处于活动的中心。正如F.佩鲁所言,“我个人的信念是,对发展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

① I.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②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15页,华夏出版社,1987。